

专栏导语

倪 星*

权，然后知轻重；度，然后知长短。有效的廉政政策取决于对现实腐败状况的精准把握，但鉴于腐败行为天生的隐秘性，如何测量真实世界中的腐败一直是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难题。目前，国际学术界关于腐败测量的方法主要有主观感知调查、贿赂行为调查、直接观察估计、差值估算、市场行为推测、案件统计等，可归结为客观测量与主观测量两大类。客观测量一般以官方公布的腐败案件为依据，但腐败案件的披露更可能说明的是官方反腐败决心和力度的加大，将其视作测量腐败严重程度的指标，往往面临着逻辑倒错的困境。主观测量一般以公众态度调查为基础，其中，国际透明组织（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）的腐败感知指数（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）、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数（Corruption Control Index）最为知名，前者覆盖的样本国家和地区为170个左右，后者样本更是多达190个。但是，这些评价体系均是基于西方价值观构建起来的，发展中国家的得分普遍不理想。最近的一个例子是，在中国政府近年来做出巨大反腐败努力的情况下，2014年底国际透明组织对中国的腐败感知指数评分和排名却大幅下降，引起了很大争议。

为了解决上述难题，廉政理论界一直在锲而不舍地进行努力，其基本趋势是整合主观测量与客观测量，在多元认知、信息饱和与深度挖掘的基础上，尽可能接近真实状况，解决腐败与反腐败中的信息不对称悖论，从而有针对性地调整和优化反腐倡廉策略。本专栏选取的四篇文章，分别在不同层面顺应了上述趋势，为推动廉政研究领域的知识增长做出了努力。

过勇、宋伟的论文《腐败测量：基于腐败、反腐败与风险的视角》，系统梳理了腐败测量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，分析和回应了相关理论争论，在此基础上力图建构一个全新的腐败测量框架。论文从腐败状况、反腐败绩效和腐败风险

* 倪星，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/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/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，教授。

三个维度出发，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相结合，从投入、机制、结果、效果四个层面设计具体指标，形成了包括 68 个三级指标在内的腐败测量指标体系。其中，腐败状况是对已经发生的腐败感知及其变化的评价，属于过去时评价；反腐败绩效是对当前反腐败工作有效性的评价，属于进行时评价；腐败风险是对未来发生腐败可能性的评价，属于将来时评价。在测量中，三个维度从不同的角度出发，可提高测量的科学性、真实性，从而对腐败程度做出更加客观的判断，帮助制定出更加有效的反腐败政策。当然，该文提出的新方法尚处于理论建构的阶段，其具体信度和效度如何尚需要进行实证研究和实践运用的检验。

孙宗锋、杨丽天晴的论文利用广东省两市市委书记被立案查处的契机，结合 2014 年广东省清廉指数调查中的公众感知数据，进行了一个难得的准实验研究。他们发现，在短期内官方反腐败力度的加大并不能改善公众的腐败感知，反而会恶化公众腐败感知。可能的解释是，一般公众在对政府腐败程度进行判断时，难以有效区分腐败程度和反腐败努力之间的关系，往往会将腐败官员被调查视为腐败恶化的表征。但是，这背后深层的原因需要进一步探讨。在实践中，这一发现提醒我们要注意提升反腐败工作的透明度，增加公众的反腐败参与度，改善对腐败案件的宣传策略。

在政治体系的运行过程中，精英政治的基本逻辑贯穿始终。不同于上述论文依赖于一般公众的调查数据，李莉的论文独辟蹊径，对香港政治精英中的区议员群体召开问卷调查，了解他们对廉政公署的看法。研究发现，区议员对于廉政公署的执法有效性评价高于独立性评价；区议员的评价因年龄和党派不同而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别；区议员的评价与对腐败现状的观感存在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。作者提醒我们，在腐败治理过程中，重视主观测量，不仅需要着眼于社会民众的整体观感，而且还需要重视政治精英的观念、态度等主观感受，因为他们对民众的观念发挥重要影响，进而能够间接影响到反腐败制度的执行与落实。

各国的经验均表明，只要存在着政府管制，腐败问题就会如影随形。为了实证检验其间的关系，李后建、马朔同样选择了运用主观调查数据。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，他们的论文分析评估了官员更替、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行为的影响。研究表明，繁重的政府管制是腐败官员抽取企业贿赂的重要工具，当年的权力转移与交接会激发企业竞相寻租的动机，引发企业的贿赂行为。更重要的，当前的权力转移和交接会导致管制政策的复杂化，强化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的积极影响。不过，随着权力转移和交接的完成，企业寻租的动机开始弱化，贿赂行为也开始减少，同时管制政策也逐渐明朗，复杂化程度逐步降低，由此导致的企业贿赂行为也逐渐收敛。基于此，文章提出应推动以治理结构为中心的“合规治理”向以治理机制为中心的“有效治理”

转变。

众所周知，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，也是社会之癌，其发生机理错综复杂，故而需要综合的分析视角、系统的治理策略。本专栏的四篇文章，分别将立体多元的思维用于腐败测量体系的构建，并从普通公众、政治精英和企业家的感知调查视角展开实证研究，提出优化廉政建设的具体策略。其主题互相配合，研究视角彼此补充，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腐败研究全景图。毋庸置疑，相对于中国当前热火朝天的反腐败实践，理论界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。这里当然有各种因素的制约，但理论担当的不够、研究方法的欠缺是主要原因。我们呼吁更多的学界同行投身于廉政研究领域，更期待廉政研究方法上的实质性突破，以更好地揭开腐败与反腐败的“黑箱”。